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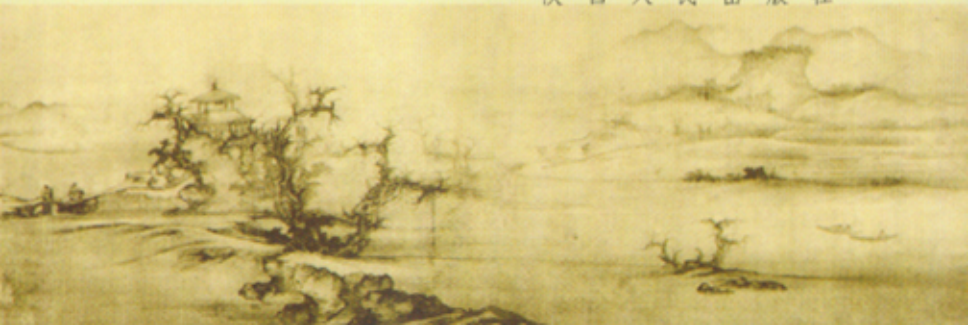
魏晋

WEIJIN SANDA  
SICHAO LUNGAO

三大思潮论稿

田文棠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序一】

## 重估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

## ——读《魏晋三大思潮论稿》

赵吉惠

魏晋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不只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宇宙本体论思想，而且冲破了两汉儒家经学烦琐支离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次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无论在理论思维的水平上抑或对于人生的理解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两汉时代。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们对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挖掘不够。汤用彤先生1957年出版的《魏晋玄学论稿》实为拓荒之作。汤一介所著《郭象与魏晋玄学》（1983年出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5年出版）以及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把对于魏晋思想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田文棠同志二十余年埋首于魏晋经传，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第一次以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为理论线索撰成《魏晋三大思潮论稿》一书。拜读之后，启发良多。田著确实深化了对于魏晋思潮的认识，特别是在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的捕捉与体悟方面作出了历史的突破，对于魏晋学术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 一、重新评估魏晋思潮重视人文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多把脱离实际的“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主题，很难理解它的文化精神与社会意义。本书另探新路，提出：“魏晋思想是一支旋律优美、节奏激扬的人生畅想曲。”认为“人的自觉，亦即人的主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价值的自我认识与觉醒，则是这支畅想曲的中心主题和基调。”围绕这一主题、基调，形成魏晋思想的“天人新义”，及其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整体与层次结构。这个层次结构的主要因素则是：自然基础、性命原则、理想人格、自我价值。经过作者以如此明快的笔触对于魏晋思潮所进行的层次结构与时代主题的确认与分析，则比较有深度地概括出了这一历史思潮的思辨理性与理论特色。沿着这一思路，作者进一步运用比较方法指出：同先秦时代这一“反思”活动相比，魏晋时期以上述三大思潮为其主要内容的人的自觉和“反思”，则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深的程度上开展的，它涉及“天人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人的价值、社会名教、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的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形成以追求理想人格和自我价值为核心的思想新模式。何以形成这种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呢？作者从魏晋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指出：这是一个战乱频仍、思想解放的时期，一切旧的规范制度与社会秩序逐渐崩溃瓦解，与此相适应的烦琐经学与伦理道德也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于是人们要求摆脱外在权势和陈旧观念的束缚，以便认识和把握真正的自我，肯定人的自我价值，从而迅速形成一种自觉意识，这便是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三个方面：名理学家把人的外在才能的自觉作为他们论述的中心。关于才

性问题的辩论，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充分重视人的个体所表现出的外在才能。玄理学家则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自觉，这是人的自我价值由外在的形质转向内在的神韵的一个重要阶段。主张“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把名利置之度外，“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佛理学家则沿着上述的思路走下去，把人的内在精神的自觉发展为人的思辨信仰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却倒向了对神的崇拜，终于改变了人的自觉方向，窒息了人的个体才能的发展生机。由于作者对魏晋思潮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的机智捕捉，便大大地加深了对魏晋思潮的人文理解并展示了新的研究思路。

## 二、重估魏晋思潮的历史地位

过去在评价魏晋思潮时总是时隐时现地带有传统偏见的烙印。封建社会旧史家多以“名教”伤害人性，败坏道德，破坏人际之间的融洽和谐的关系，甚至认为魏晋“清谈”乃是导致“晋亡之因”云云。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学者又多指责“玄学”唯心主义的消极性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颇少从积极方面进行考辨。本书首先以科学分析的态度指出：“晋之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清谈，而在于当时的经济凋敝和政治腐败。”至于魏晋“清谈”的历史地位应当重新估定，可以有根据地说，“它的主导方面是好的”，应“充分肯定它在发展我国学术思想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魏晋“清谈”是在曹魏正始前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探求“三玄”之理为主要旨趣的一种说理与思辨性很强的小型自由讨论。作者明确断定其性质是一种“学术性的思想争辩”，而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空谈”，这在当时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丰富智慧才能，开展学术争鸣，提高抽象思维都有

一定促进作用与意义。竹林时期的“清谈”名士，多以发挥庄子有关逍遥放达的思想为旨趣，目的是为了从政治思想方面揭露当时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旗号，推行违背“自然之性”的暴虐之政的虚伪面目。嵇康、阮籍正是由此拿起了自然哲学的武器对封建礼教大张挞伐。在自然科学领域，它使人们冲破了种种神学迷信的旧俗，去直接认识自然界，导致了许多重大的，甚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它使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大大促进了山水诗画这些新的文艺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正是由于这些历史作用，才足以说明魏晋时代确然出现了思想奔放、学术自由发展的新风。魏晋思想结构的理性思辨在形成中国文化的抽象思维意识方面，他们崇尚“天道自然”、“性命自得”的思想观念，对于否定秦汉以来“天”的神灵意志和人对“天”的偶像崇拜，对于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和谐发展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对魏晋思潮既有肯定又有批评。指出：“魏晋思想系统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心理形成过程中，都曾经发挥过它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它的消极方面就像沉重的包袱，压在人们的心上，消磨着人们的意志……对于这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都应认真地全面地加以总结，以作为我们建设新时期精神文明和发展新的思想文化的重要借鉴。”

本书前三章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为全书奠定了宏观理论框架，在魏晋思潮理论方面作了大胆的突破。以后十章主要是微观问题的探讨与论证，史料详实，论皆有据。本书的不足之处，愚以为对魏晋思潮在奠定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阐述过于简略。望再版时开辟专章进行深入地论述。

---

（作者系已故著名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该文发表于《哲学研究》~~1985~~年第 1 期）

## 【序二】

## 魏晋“天人新义”的哲学反思 ——《魏晋三大思潮论稿》评介

卢升法

《魏晋三大思潮论稿》，是一部专题性的学术著作，是著者多年研究和反复思考的结晶。

魏晋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文化复兴的黄金时代，而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思想解放或文化复兴的高涨，又必然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人之“反思”为其先导。著者洞悉这种以人的主体内在性的自觉为特征的“反思”意义，并以此考察了魏晋时期解放思潮的过程，深刻指出：“魏晋思想是一支旋律优美、节奏激扬的人生畅想曲。人的自觉，亦即人的主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价值的自我认识与觉醒，则是这支畅想曲的中心主题和基调。围绕这一主题、基调，形成魏晋思想的‘天人新义’及其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整体与层次结构。”

《论稿》对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潮，即名理学、玄理学和佛理学等三大思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揭示了三大思潮之间的纵横关系：从纵的方面看，它们“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各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人的自觉，形成魏晋思想的不同风貌与特征”；从横的方面看，则是“一个由自然基础、性命原则、

理想人格和自我价值等四大因素组合形成的完整而有机的层次结构。强烈的思辨理性则是这一层次结构的理论特征。”魏晋思想系统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心理形成过程中，都曾发挥过它的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其消极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后果。

《论稿》至少有以下三点是值得赞扬的。

第一，给“清谈”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清谈”的声誉，在历史上可谓之狼藉。然而《论稿》力排旧议，从学术的角度，给魏晋“清谈”以甚高的地位。著者把“清谈”作为“三大思潮的共用形式”，并具体地考察了这一共用形式在不同时期的共同表现与作用。谈到“清谈”的直接思想渊源，则追溯到汉代的王充，认为正是王充《论衡》一书中所阐扬光大的老庄自然思想，经蔡邕等人一传而再传，以至开拓出魏晋“清谈”之风。这样就把“清谈”置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长河中，有了“合法”的资格，复其本来面目。特别是以魏晋时期几次重大论争为依据，把“清谈”定为“开展学术讨论的新形式”，从而使“清谈”从长期被游离于历史之外又回到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上，更具有普遍、具体和丰富的历史性格。著者进一步指出，“清谈”是以探求三玄之理为其主要旨趣的一种说理与思辨性很强的小型自由讨论，在当时对于解放人们思想、丰富智慧才能、开展学术争鸣、提高抽象思维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意义；认为魏晋“清谈”与魏晋三大思潮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魏晋“清谈”的酵母和助产作用，魏晋思想的形成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总之，《论稿》对“清谈”的正名，可谓入情合理而又十分必要。

第二，重视逻辑范畴的研究。著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

典著作，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分析了三大思潮形成的社会历史等原因及过程之后，其功力所长便表现于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研究。魏晋思想，特别是“玄理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其特点之一就是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著者在这方面的探讨具有一定深度和系统性。在对魏晋玄理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的分析中，提出的八对范畴，虽然有的是先秦哲学中已有的，但在玄学中，其内容更加丰富，含义也更加明确。特别经过著者的分析、探微、综合，更显示了传统哲学在这方面的成就。例如在第九章“郭象《庄子注》的哲学范畴及其内在联系”中，提出了十对范畴，其中颇有新意。

第三，突出了哲学方法的研究。著者在揭示三大思潮的思辨方法体系之后，分别就其六个具体方法，诸如名实相一的方法、辨名析理的方法、显中探幽的方法、本末相兼的方法、有无双遣的方法、色性俱灭的方法等一一作了分析。这些具体方法分而论之，大有内容可挖。《论稿》对六种方法的剖析论证，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像这样把六种方法放在整个“思辨方法体系”中阐述，确有创见。著者认为：“由于魏晋三大思潮有着同一的中心主题和层次结构，反映在方法的运用上，也就使整个方法体系内部各种方法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关于哲学思想体系与哲学方法的辩证关系的纲领性概括是卓见的，而如果按照上述意见去做一番更细的考察，将会感到该书更加精彩。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博导，该文发表于《博览群书》~~1983~~1984年第 苑期）

## 【序三】

## 一部颇具特色的中国断代思想史

### ——评《魏晋三大思潮论稿》

刘学智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思想活跃、思潮跌宕，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汉末以来儒家经学日趋衰落，于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名、道、法之学日见活跃，加之佛教传播，道教生长，社会思想出现多元化趋向。这是魏晋时期思想史的基本面貌。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人们已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特别是汤用彤先生对此曾做过开拓性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对魏晋思想的研究较之先秦和宋明，仍显薄弱。而且，以往人们的研究，多着力于玄学思潮，未能对魏晋时期的全部思想线索作出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田文棠同志的《魏晋三大思潮论稿》（以下简称《论稿》）一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论稿》是田文棠同志近年来在潜心研究魏晋思想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力作。著者在书中对魏晋时期以名理学、玄学、佛教三大主流思潮各自的源流脉络、内容特征、范畴建构、方法特征以及各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都作了较深入的剖析，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断代思想史论著。

《论稿》的突出特点，首先表现在它对魏晋社会思想从总

体上作了全方位的把握，既见木，又见林，基本理清了魏晋主流思想的线索。作者对所谓的“清谈”误国的旧议进行了反驳，对“清谈”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观的评述，指出“清谈”几乎渗透到魏晋思想各主要流派酝酿成熟的全部过程。作者认为，名理学是在社会思想趋于多元化的情况下，由儒、名、道、法诸家思想融合而成的，并对它的特征和作用作了充分的阐述，这恰恰是已往学术界不大注意的。尽管名理学应否看作魏晋的主要思潮之一的问题仍可讨论，但作者的研究无疑是值得重视的。玄学是名理学演变的结果，而其思想特征则是儒道合流的产物。佛教在魏晋时期处在初传阶段，先是出现佛学的玄学化倾向，继之，玄学又被佛学化，故中国化的佛理，在魏晋时期表现出明显的佛玄合流的特征。名理、玄理、佛理三种思潮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三者既前后相继、各有所承，又相互渗透、互相融合，形成魏晋思想的交响曲。《论稿》对魏晋思想错综复杂的关系演变和发展，从三个主流思潮入手，力求从总体上鸟瞰，并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

其次，《论稿》对魏晋三大思潮的中心主题和基本精神作出了新概括。认为贯穿魏晋三大思潮的中心主题和基本精神是“人的自觉”，即人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觉醒。作者首次提出名理学、玄学和佛教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的自觉，并着重对玄学的“天人新义”从自然基础、性命原则、理想人格、自我价值等方面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展现了魏晋人追求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的层次演进和基本模式。作者认为佛教虽然把人的内在精神的自觉发展为人的思辨信仰的自觉，但却改变了人性自觉的方向，使人

的自觉转向对神的崇拜，从而窒息了人的主体能力的发展生机。《论稿》对魏晋思想中心主题的概括是有新意的，分析是有深度的。

再次，突出地研究了魏晋各主要思潮建立体系的方法，也是《论稿》的重要特点之一。该书认为，魏晋三大思潮既有着同一的中心主题和系统结构，因而在建构各自的思想体系时，就有着基本趋于统一的方法，这就是思辨方法。这是一种与汉代经验方法不同的，旨在现象的经验世界之外探寻世界本体所需要的特殊方法。作者具体把这种思辨方法从名实相一、辩名析理、显中探幽、本末相兼、有无双遣等方面加以阐发，认为这是三大思潮建立体系通用的基本方法。由此构成魏晋三大思潮的思辨方法体系。同时，还对玄学言意之辩、佛教“中观”方法，也作了具体分析。《论稿》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魏晋时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思辨方法的体系。对一个断代的思想史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上作如此详密地分析，这在过去还是不多见的。之所以以较大气力去研究魏晋思想的方法体系，正如作者所说，是因为弄清它，就找到了理解魏晋思想体系奥秘的钥匙。

其四，《论稿》重视了魏晋思想范畴体系的深层挖掘。任何思想体系无不是通过范畴及其关系的演进得以展现的，魏晋思想以其超越前人的抽象性、思辨性，因而在范畴的建立和运用上更具有特色。《论稿》对各主要范畴及范畴体系的研究可以说已从表面深入到更深的层次，对其严密、新异、成对的特点作了深层的挖掘和揭示。对王弼玄学，作者从“有无”、“体用”这些基本的范畴入手，深入到各个层面，剖析了玄学贵无论如何通过一多、静动、明知、言意、道德、性情诸范畴

来揭示“有无”关系，以及逐步把汉代宇宙生成论推向宇宙本体论，把自然之性与纲常名教统一起来的思维进程。对郭象思想范畴体系的研究尤其深入。相对地说，郭象思想是玄学成熟时期的思想，因而其范畴体系亦较为完整。作者认为郭象玄学有十对主要范畴，其中有与无、独化与玄冥、性命与天理、有迹与无迹、可知与不知为基本范畴，反映了郭象对世界存在的观点；自为与相济、小变与大常、安生与安死、有为与无为、自是与相非等范畴为从属的范畴。如果说前面五对基本范畴，已为学术界所重视，而后者五对从属范畴则是作者较早挖掘和首次系统加以说明的，这对于进一步弄清郭象思想体系的结构和性质是十分有益的。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分析范畴时，总是注意把它的含义严格地限定在某种特定的思想体系中，而不是一般地空泛地玩弄概念，这种态度和方法也是很可取的。

最后，《论稿》在全书体系框架的建构上也有特点。作者没有重复以往流行的以人物为线索叙述思想史的方法，而采取以思潮为主线，把人物思想放在特定时空环境和思潮氛围中加以呈现的方法，克服了空泛和纯理论的说明，这就使魏晋思想史的研究更有坚实的社会历史根据。这样，在作者笔下，任何人物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和发展的。

当然，要驾驭一部鸟瞰中国古代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思想发展总体面貌的思想史论著，是有相当难度的，因而《论稿》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作为从魏晋主要思潮入手来揭示这一时期全部线索的论著，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线索，这就是儒学。儒家经学在汉末魏初虽然出现了衰落之势，以至魏晋时期其地位有所失落，但是，无论是风靡一时的玄学，还是正在

崛起的佛教，它们只是打破了儒学的垄断，而没有取代儒学的宗主地位，儒学依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者治国方略的主要理论依据。儒家思想仍然是社会确立道德规范的准则，况且儒学的研究、解说也一直未中断，在理论上也有相当的建树，还涌现了不少有名的儒学学者，如范宁、郭朴等。《论稿》虽然也多次提到三大思潮与儒学的联系，但没有把它作为一条主流线索写进去，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这也许与学术界长期形成的偏颇有关。此外，对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尚嫌薄弱。不过瑕不掩瑜，总体上看，《论稿》不失为一部成功地全面论述魏晋思想发展史的专著，值得一读。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该文发表于《人文杂志》~~1982~~1983年第 3 期）

## 第一章



### 魏晋清谈与魏晋三大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古往今来的学者，对魏晋清谈瞩目者甚多，但赞誉者却很少很少。“清谈亡国”、“清谈误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定论”。但对这些议论，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完全赞同。比如在魏晋时期，就有人赞扬当时的清谈名士王弼是“妙思通微”，而何晏为“神怀超绝”。唐代的著名学者孔颖达则称赞王弼的《周易注》“独冠古今”。宋人更说它“晒如朝阳，坦若大逵”。清时朱彝尊著《王弼论》，认为“汉儒言《易》或流入阴阳灾异之说，弼始畅其义理”；钱大昕则著《何晏论》，把王弼和何晏的《周易注》与《论语注》称为“更数千载而不废”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王弼的《周易注》，尽废象数之学。章炳麟赞扬王弼的《周易注》、皇侃的《论语义疏》“近古莫能尚也”。梁启超一方面认为，“若著政治史，则王何等伤风败俗之罪，固无可假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王弼、郭象等人，在学术思想上自成一家之言，“皆有其所得心之处”。刘师培则认为清谈虽然“无益于治国”，但“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他赞扬“二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

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是“不染于污时者”。唯独明末清初之际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敢于力排众议，理直气壮地为魏晋清谈刷洗历史上的罪名，给以比较公正的评价。他在《读通鉴论》中这样写道：晋之所以乱国、亡国，“是以强宗妒后互乱，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鬻乱，国无与立，非王衍辈清谈误之也”。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于魏晋清谈，及其在魏晋三大主流思潮，即魏晋名理学、玄理学、佛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依据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客观的评价，以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 一、晋之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清谈

“清谈亡国”、“清谈误国”，这是晋时一些坚持儒家立场的政客、学者最早提出的一种责难。他们立论的根据，主要是所谓清谈学者蔑弃名教，不师周孔。简文帝时曾以“洁己修礼”、“崇学敦教”闻名的范宁，认为“中原倾覆”之源始于王弼、何晏，指斥他们“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聘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晋书》列传四十五·范汪）晋明帝时的东中郎长史卞壶也在皇帝面前斥责清谈学者王澄、谢鲲，谓其“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晋书》列传四十·卞壶）东晋桓温于北伐途中，登高眺望中原故土，也很有感叹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桓温传）晋时学者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葛洪在《抱朴子》中，都对清谈名士的所谓